

# 党的创立时期在建党问题上 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马 功 成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党的创立时期，我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曾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斗争，特别激烈的是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的时候，回顾一下在建党问题上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对今天肃清林彪、“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流毒，坚持党的领导，是有意义的。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反动思潮。斯大林曾经指出：小资产阶级“是滋长各种无政府主义派、半无政府主义派和‘极左派’的最好的土壤。”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大量存在的国家，这是无政府主义产生、滋长的深厚的社会基础。早在二十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想就开始在中国传播了，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起过冲击封建思想和军阀统治的作用。但是，在十月革命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政府主义者就把他们的斗争锋芒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其所办的《奋斗》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和《我们为什么反对布尔什维克》等文章，反对在中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政党，主张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权威的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党。有的人还在共产主义小组中进行活动，极力扩大他们的影响，破坏建党工作的进行。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扫清

在建党问题上的严重障碍，不得不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在《新青年》和《共产党》上发表了《讨论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解剖》等论文，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此外，“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共旅欧支部在巴黎创办的《少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创办的《先驱》，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青年周刊》等，也都展开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斗争首先集中在要不要建党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叫嚷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说什么“中国的国民性既不容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而中国的社会情形又向来是无政府已惯的，所以一旦要实行劳农政治，要组织强有力的中央机关，我真不知其可也！”（《答存统的信》）针对这种谬论，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指出：整个世界都在朝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要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行，“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革命不是人们凭主观愿望造出来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一种合于规律的现象。“社会革命的标准，在无产阶级经济生活被压迫、被剥削的程度之深浅及阶级觉悟的深浅。”只有无政府主义空想家，才“好以个人的头脑来支配世界，

他们拿着‘中国不适于’这句话来反对一切。”（《共产党》第五号）当时，中国人民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势力的统治之下，“全国民在这徬徨歧路之中，那一派人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而出，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呢？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的使命。”（同上《短言》）事实正是这样。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社会改造！社会革命！这种思想，这种呼声，这种运动，最近就在暮气沉沉的中国，如旭日东升一天天地高起来了。”这就充分证明：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建立“劳农专政”，“乃是时代的要求，现存社会的产物，不但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反是救人济世的福音！”（《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还针对无政府主义叫嚷中国社会“向来是无政府已惯的”，不具备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条件的谬论，明确指出：第一，由于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的爆发，许多西欧国家无暇东顾，放松了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束缚，使“中国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了相当的增长”（《星期评论》第四一期）。第二，“工人的罢工运动”，有迅速的增长。无产阶级受到实际的锻炼，他们“已由不觉悟到了觉悟，由不行动到了行动，而且是坚决勇敢的行动。”（《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第三，五四运动，使“中国无产阶级已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的路上来了”。身受几重压迫的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现代社会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礎。”（《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这些充分说明，组织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有必要，而且有了可能。

在建党工作的开展和日趋成熟时，无政府主义者又主张要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党，“废除一切强权”，实现没有阶

级、没有剥削、没有国家的社会。他们还在《无政府党之道德》（《进化》第三期）等文中，大肆鼓吹他们的主张。马克思主义者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对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指出：“无政府党虽然要想绝灭资本主义，可是没有手段，而且反不免有姑息的地方”，“因为他们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在事实上都有许多矛盾的缘故。”（《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在讨论中，毛泽东、蔡和森和其他共产主义者还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主张。

关于党的性质，一九二〇年八月，蔡和森同志在给毛泽东同志的通信中明确指出：“我以为现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必须“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队，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旅法的共产主义者也有针对性的强调指出：“我们主张立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参加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少年》第二号）当时国内的共产主义战士，几乎都在从事工人运动，他们把工人称为“劳动者”，上海和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就分别把自己创办的通俗工人刊物命名为《劳动界》和《劳动音》，因此这里的“劳动阶级”也就是工人阶级。由此可见，他们对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是有明确认识的。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在给蔡和森同志的通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就是说，共产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共产主义者深深懂得

从思想理论上建党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明确指出：“真正的革命党，如无革命理论是不行的。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一个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能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他们还认为：正确的思想理论，决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坐在房子里空想出来的。“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他们严厉地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宣扬“个人万能”，视社会改造为他们几个人的“掌上珠、图案画和绣花衣，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去制造，去点缀，去修饰，去和颜配色，去装腔作势，去包揽把持，去迟早其时，去上下其手”，并且指出，不管他们怎样把“理论学说绣得好看”，“一旦无产阶级的生死问题迫来”，他们这些人就会同军阀财阀“结为神圣同盟”，“是遏制不住的”（《新青年》第九卷四号）。事实正是如此，在喧嚣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中，有的人后来就堕落为反动派的帮凶和走狗。如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后来成了汉奸，黄凌霜则成了CC派的特务头目之一。

关于党的组织原则，这是无政府主义者攻击得最厉害的问题。他们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反对任何性质的组织和纪律、集中和领导。他们毫不隐讳地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他们认为，任何组织和纪律，都是外来的强加于人的“自由意志”之上的东西，“一有‘规则’，就没有自由，不必说……他们定下来要我实行的是没有自由，就是自己定下来自己实行的，有时也觉得束缚不堪。”（《国民》第二卷第三号）无政府主义者还反对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认为办一件事情，只有人人同意，才算真正的自由。他们诬蔑共产党为了求得“整齐一致”，就用种种纪律来束缚个人的自由等等。马克思

主义者针对这种“绝对自由”的谬论，强调指出：“铁的组织 and 铁的纪律对无产阶级共产党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样的组织和纪律，不能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并强调“党的组织为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在人类社会，自由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要个人的绝对自由，就只有离开社会，去过孤独生活。但是，“试想一个人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独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自由可以选择”（《少年中国》第二卷七号），甚至连他个人也无法生活下去。因此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毛泽东同志在给蔡和森等在法诸友的信中指出：“对于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马克思主义者还据理驳斥了所谓“人人同意，然后才能执行”的谬论，指出：“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么可能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新青年》九卷三号）“这种散沙的现象”，根本“不适宜于大规模的生产事业”（《新青年》九卷四号）。周恩来同志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也说：“无政府主义……自命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他们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无什么具体主张。”（《少年》第二号）总之，正如当时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指出的，“无规约的组织，无集中的权力，好象一盘散沙的无政府党”，是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青年周刊》第三号）

在建党问题上，通过这场大论战，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实质，宣告了无政府主义

在理论上的破产，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觉悟程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更加深入人心。没有这场斗争，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不可能的。

在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也曾有人对无政府主义发生过兴趣，或受到影响，但他们在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实际斗争中，很快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陈延年同志最初就曾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在留法期间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了解欧洲工人运动情况后，不仅摆脱了这种影响，还直接参加了《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和无政府主义者编辑的《工余》杂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施洋同志最初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但他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研究改善劳工地位问题之后，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空想，不能在实际上解放劳动阶级，从而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才能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施洋先生纪念录》）。

在建党理论上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在组织上也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成立之初，就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混入。如广州小组最初就曾被无政府主义者所把持，后来重新改组。北京小组黄凌霜、袁明熊等人，在通过小组的纲领时，对无产阶级专政一条表示反对，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小组。各地小组经过斗争也发生了同样的分化。这样就把更多的革命分子团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使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在组织上更加纯洁，在思想理论上更加坚强，为党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初建时，也混入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凡遇一件事或一个问题意见不能统一，团的组织和团的

训练，就不能执行，其精神当然不振，到了一九二一年五月，看到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解散。”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马克思主义者恢复了青年团，确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清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团的组织才得以巩固（《先驱》第八号）。在一些工会组织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曾经相当严重，广州的茶居工会和理发工会就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下成立的。一九二〇年在长沙成立的湖南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庞人铨也曾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主张不要严格的组织，不搞政治斗争，致使工人运动的发展受到了阻碍。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对黄、庞和劳工会的其他优秀分子进行耐心地教育和争取工作，终于使黄、庞提高了政治觉悟，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接受了共产主义，并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七日，黄、庞在领导长沙工人罢工斗争中，被反动军阀赵恒惕杀害，为工人运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周恩来同志当时得知黄、庞英勇牺牲的消息后，在悲愤中写了《伍的誓词》和《生别死离》的壮丽诗篇，以表示悼念。黄、庞的转变，是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一斗争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就更加广泛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所说：“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绝对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人民反帝运动结合以后，才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雄伟的力量。并在这以后，马克思主义永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占着主要地位。”（《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专辑》）